

[美]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 —— 著

Sanjay Subrahmanyam

葡萄牙帝国

巫怀宇 —— 译

在 亚 洲

[第二版]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

[美]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 —— 著

Sanjay Subrahmanyam

巫怀宇 —— 译

葡萄牙帝国 在 亚 洲

[第二版]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



PUTAOYA DIGUO ZAI YAZHOU: 1500—1700

责任编辑：徐 婷

助理编辑：任建辉

责任美编：林 林

责任技编：郭 鹏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2nd edition) by Sanjay Subrahmanyam. ISBN 978-0-470-67291-4
Copyright © 2012 John Wiley & Sons Ltd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翻译出版权由 John Wiley & Sons, Inc. 授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和形式复制或抄袭
本书内容。

本书封底贴有 Wiley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7-1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第二版 / （美）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巫怀宇译．—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598-1049-6

I. ①葡… II. ①桑…②巫… III. ①国际关系史—
葡萄牙、亚洲—1500-1700 IV. ①D85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11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889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5.5 字数：326 千字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8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成
为
更
好
的
人

译者序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的《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第二版）的翻译工作历时大半年终于完成。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才体会到这一工作的难度。从范围上说，这是一本在短短三百页内（原书），以两百多年的葡萄牙殖民史为线索，贯穿西欧、南美、印度洋沿岸、东南亚、中国东南部与日本的全球史著作，描述了诸多势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合作与冲突。

正如作者一再主张的，在印度洋沿岸直到东亚的广阔地图上，权力版图错综复杂，社会文化千差万别，无法被一套简洁的模型所解释。这使得本书成为一本真正的史学著作，旨在讲清楚过去所发生的事，并挑战了试图将诸事兴衰归纳简化为历史规律（或社会学模型）的诸种企图。作者深入每一具体地点描述时代变迁，将传统的“帝王将相”的政治史，变成了船长、地主、商人、海盗、雇佣兵、传教士的历史。书中数百角色皆有名有姓，因篇幅所限，许多重要人名和地名只出现了几次，但他们在历史上绝非“次要配角”。

本书英文版中涉及阿拉伯语、马来语、缅语和非洲当地语言等语言时，许多情况下都只用拉丁字母拼出了读音，并未翻译其意义，似

是默认专业同行应当具备这些语言能力，或至少熟悉相关词汇。然而考虑到汉语世界的广大读者，译者还是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检索工具查出了其中大部分，在必要之处还写了译者脚注。凡作者以英文译本引用明代古籍之处，也都找到了古文原文。

此外，历史学术著作的翻译总会遇到某些不可译的或易引起跨语境误解的概念。在此仅举出几例：Estado、company、Carreira da Índia 和casado。

Estado对应英语中的“state”。然而state是欧洲早期近代史上的关键概念之一，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正是它的形成期。因此Estado da Índia无法翻译成“印度国家”，因为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是葡萄牙人以果阿为总部在印度洋沿岸设立的一系列据点，不具备当今的（或多或少韦伯式的）“国家”概念，于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翻译为“葡属印度”，只有在少数强调它的官方性质时才译为“葡属印度国家”。

Company译作“公司”是汉语通用的翻译，本书也遵循此约定译法，在此提出这一点是为预先提醒读者“公司”的现代意义容易误导出时代错乱的想法。其实company的字面意思（集团、团伙）更符合东印度公司这样拥有武装力量的准国家组织。

Carreira da Índia字面意义是印度航线，但并不是说书中提及的葡属亚洲内部的贸易航线，而是指从里斯本去往印度的航线，因此与好望角航线几乎是同义词。区别在于Carreira da Índia是葡萄牙王室年度组织派遣去往印度（尤其是果阿）的，而好望角航线只是通往印度洋沿岸地区的一个地理概念。

Casado或许是葡属印度历史上最难翻译的概念，其字面意义是“已婚者”，但在那个时代却意味着有家庭顾忌、在亚洲官方定居点内居有定所（不会逃亡流窜），因此也就有一定社会信誉的城镇中产阶层（本书中“class”一律译为阶层而非阶级）。可见尽管作者声明此书仅是政治经济史而非社会文化史，社会文化却提供了政治力量赖以运作和表达的语境。

本书英文版作者在列举地名时，通常使用的是古地名或地名的古代拼写。17世纪之前的欧洲文献常见问题是此时尚未形成标准拼写，这也使翻译工作更加困难。因此翻译过程中除了最常查阅的两本参考书，即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和《世界地名翻译手册》之外，还需要参考一些相关史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本书（第一版）在1997年于澳门出版的旧译本，以及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在某些观点上，例如荷兰人于1680年后是否已取得霸权的问题，本书并不赞同里德。学者的观点相互分歧，但译者的工作却是一致的。

本书的第一版于20年前曾有过旧译本，有不少错误，在本书第二版重译中我做了大量修正。然而我无法苛责前人，因为新版本的进步，一则是有了旧版本的参考，更重要的是有强大的信息检索技术，而这是当年的译者无法使用的。

最后，在翻译本书（尤其是检索查阅各种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由于译者并非葡萄牙史或东南亚史方向的学者，在翻译过程中战战兢兢，不放过任何可疑的概念，尽可能多地查阅相关资料。但历史研究的难度正在于对可疑概念的觉察，

历史的可能性总是超越个人想象力的极限，这涉及对我们习以为常、先入为主的前见的怀疑，也是非此方向的学者很难做到的。若有疏漏，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7. 09. 30

第二版序言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本书第一版于1991至1992年完成于德里，20年光阴已逝。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关于16至17世纪葡萄牙在亚洲的重要研究。这些著作大多以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写成，偶尔也以其他语言，有专著、论文和集体多卷作品，也有单一或多位作者写成的综合性著述。由于葡属亚洲史学写作仍是个很小的圈子，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我或多或少认识。我满怀兴趣地追踪着这些不断增长的著述，有时也用自己的论著添砖加瓦。

然而，尽管本书作者在1992年时才30岁出头，本书的穿透力和全面性却仍未被这些年来的新著全盘超越。诚然，一些细节需要修正或详加阐释，而且原作中确实有一些事实性错误。凡是可能的地方，我都予以了修正。我感谢1993至1995年间那些在书评中指出这些错误的人。

有少数评论者认为本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并采取激进而好辩的立场反对它。我既无法在序言中，也无法在书中回应他们，因为本书旨在提供综合性的图式，而非争辩。我在其他恰当的场合已经这样做过了。尤其我认为，1997至1998年在葡萄牙，围绕着纪念达·伽马的信

息误传的不幸插曲，再次令这样的一本书成为必要。另外，有一些评论友好地建议，此书可以作为一部文化史予以重写，而不仅限于“政治经济史”，我不得不指出如此改动将会牵涉到的结构性困难。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回到这个值得挑战的目标。就眼前而言，我选择仅在必要处更新这本书的内容，或把过去20年内的所有相关文献（包括我自己写的）都加进去，而非从头再写一本。读者将会发现，此书与第一版的差别有限。对于希望阅读更多参考材料的读者，我向你们推荐我2007年的论文，以及迪斯尼（Disney）在2009年做的广泛调查。

我尤其感谢为本书给出肯定和批评意见的年轻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已经明白，或很快就会明白，历史学家的工作皆有其时限，本书也不例外。但无论如何仍要感谢贾恩卡洛·卡萨莱（Giancarlo Casale）、若热·弗洛雷斯（Jorge Flores）、朱塞佩·马尔科奇（Giuseppe Marcocci）、安热拉·巴雷托·沙维尔（Ângela Barreto Xavier）以及其他几位朋友和同事。

最后，我感谢特莎·哈维（Tessa Harvey）和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同意再版此书，给了它又一次生命。由于我的疏忽，本书的第一版中没有献词。在这一版中我将它献给两位朋友，我们至少在1985年就已相识，这段友谊迄今已伴我半生。我总是深情地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意趣盎然的日子。

2011年8月于洛杉矶

第一版序言

为一本书写序言常比写书本身更令人愉快，就如同清债几乎总是比借债更舒心。写作此书的念头源自1988年夏，当时我正在巴黎和里斯本的研讨班授课。与两地朋友的交流，尤其是新里斯本大学葡萄牙扩张史硕士班的要求，促成了这一写作。我要感谢阿图尔·特奥多罗·德·马托斯（Artur Teodoro de Matos）与路易斯·菲利佩·托马茨（Luís Filipe Thomaz）给了我去里斯本教书的机会。在当今葡萄牙史学界的葡属印度史研究中，路易斯当然是一流的，他富有启发性的观点直接反映于书中，使得这本书仿佛有了生命；我还感谢他为本书初稿给出的评价和建议。外国人看葡萄牙时倾向于过多地专注于里斯本，与玛利亚·奥古斯塔·利马·克鲁兹（Maria Augusta Lima Cruz）和阿连多·法贡德斯（Arlindo Fagundes）一同参观布拉加和葡萄牙“其他”地方的经历，有助于我更全面地看待葡萄牙，当然旅行本身也令人愉快。但愿他们能够原谅本书的冒失（presumptuous）色彩。

本书纲要于1988年秋拟定于剑桥，当时正在那里的克里斯和苏珊·贝利夫妇（Chris and Susan Bayly）以及在伦敦访学的肯尼斯·麦克弗森（Kenneth McPherson）是我的好听众。与一贯勤于通信的乔弗

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通信也有助于本书观点的成形。在与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共处的一个下午中，他帮助我澄清了伊比利亚人的问题。剑桥与莱顿研讨班上的听众们对于此书的一份较早的纲要草稿——如今已成为一篇与路易斯·菲利佩·托马茨合写的论文，载于詹姆斯·特拉西（James Tracy）编的《商业帝国的政治经济》（剑桥／纽约，1991年）——曾给予肯定，让我在坚持这项工作时充满信心。

作为一名印度经济史学者，或许在我较早的作品中，葡萄牙语史料太有限，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太功能化（e. g. Subrahmanyam 1990a）。而本书代表着一种视角转化，但我并不是在写作过程中就意图抛开亚洲史的视角。同时，这是一本综合性的作品，更关注整体而非局部。它不是一部考据果阿、澳门、帝汶、莫桑比克以及葡萄牙其他亚洲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实细节的作品，这些课题值得以更细致的方式去对待，需要远比本书更大的篇幅。因此，对于不满于本书在诸多方面（随便举三个例子：圣方济各意识形态、家庭奴隶或价格史）的疏漏的读者，我只能表示歉意，并尽可能指出相关的参考文献以为说明（cf. Marcocci 2011）。

本书完成于一个比它开始时更充满重重考验的时期。德里的局势在1990至1991年间动荡不宁，学术和社会气氛都不够好。但与朋友的交谈却给我安慰，特别是和穆扎法·阿兰（Muzaffar Alam）和苏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他们两人都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卓有帮助的评论；巴拉钱德拉（G. Balachandran）、肯尼斯·麦克弗森和盖尔·阿特曼（Gail Alterman）也是如此。我感谢他们所有人，尤其是贾维尔·辛格（Jaivir Singh），他耐心地阅读本书的半成品初稿，

对其中日本史部分兴趣尤浓。

作为一本旨在作综合性论述的书，它比一般的专著更依赖同行们的作品。我必须在此提及以下诸位：鄂法兰（Jean Aubin）、热纳维耶芙·布雄（Geneviève Bouchon）、若昂·保罗·科斯塔（João Paulo Costa）、特奥托尼奥·R. 德·索萨（Teotônio R. De Souza）、安东尼·迪斯尼（Anthony Disney）、玛利亚·奥古斯塔·利马·克鲁兹、若热·弗洛雷斯、皮埃尔-伊夫·曼金（Pierre-Yves Manguin）、萨利·奥斯巴兰（Salih Özbaran）、迈克尔·皮尔逊（Michael Pearson）、乔治·B. 索萨（George B. Souza）、尼尔斯·斯滕嘉德（Niels Steensgaard）、路易斯·菲利佩·托马茨、约翰·威尔斯（John Wills）。无需赘言，离开本领域的三位先辈——查尔斯·博克舍、V. M. 戈迪尼奥（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和奥利维拉·马克斯（A. H. de Oliveira Marques）——的著作，本书这样的一部作品也是不可能的。果阿已故的档案学者和史学家皮索伦卡（P. S. S. Pissurlencar）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引用和参照。

最后，我感谢朗文出版社对这种新的史学写作形式的信心，以及对作者延期交付稿件的耐心等待。感谢他们明智地将手稿的初稿交给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审阅，我也必须感谢他给出的评论和鼓励，但愿通过回应他的这些评论，能使最终成书更便于读者阅读。

1992年5月于新德里

导言

葡属亚洲的神秘面孔

葡萄牙征服果阿（1510）和马六甲（1511）已过去了500年，其殖民史的尘埃却刚刚有落定之势。不到40年前，“康乃馨革命”¹——被许多葡萄牙人简单地称为“四二五”而无需说出1974这个年份——的结果是，葡萄牙人最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非洲殖民地。他们在东南亚最后的据点东帝汶，也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强制收回，并于最近赢得了独立。只有澳门直到20世纪末仍属于葡萄牙——它曾是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时至今日，在如何理解和解释16至17世纪葡萄牙人建立的帝国宏业上，许多葡萄牙人、亚洲人和非洲人分歧很深。确实，甚至就连葡萄牙是否曾在那段时间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也并非确定无

1 安东尼奥·萨拉查（1889—1970）于1933年建立统合主义威权政体，即第二共和国（Estado Novo，表面意思为“新国家”），直到1974年被“四二五康乃馨革命”推翻。如同本书在最后一章所说，这段黑暗的岁月让葡萄牙人在欧洲的声誉不佳，被视为“欧洲的黑人”。另，本书如无特别说明，脚注皆非原注。

疑。因为葡萄牙扩张总是与葡萄牙民族主义和集体认同关系密切。

在卢济塔尼亚人的众贤谱中，两位最著名的诗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íadas*）的作者卡蒙斯（Luís Vaz de Camões, 1524—1580）和创作了《使命》（*Mensagem*）的“现代主义者”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1888—1935），对这一问题都观点鲜明。区分历史和神话确实是件难事，许多人甚至不愿尝试。葡萄牙学校里的儿童们一代又一代地学习和背诵卡蒙斯的伟大诗作，我在此提供我的一个版本，就如同许多更早的翻译者所做的那样：

英勇的水手，威武的船队，
离开了卢济塔尼亚西部海岸，
远涉迄今无人航行的海洋，
经过塔普罗巴纳水面，
历尽艰险，奋力作战，
超越了常人力量的极限，
在遥远的异域建立新的王国，
发扬光大，名满天下。¹

在写作这样一本长篇综释、个别章节带反思，而非百科全书式调查的书时，我想做的当然不是紧追历史的脚步从头再打一遍殖民战

1 此处依据张维民的译本《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争，或质疑那个“新的王国”是否确实那么崇高，也不是要去深入探索葡萄牙和亚洲之间复杂的文化互动的诸多面向。本书从根本上讲是一部政治经济史作品，它试图将16至17世纪从好望角到日本的葡萄牙人，置于两个相交的平面：一方面，他们被置于亚洲和东非语境；另一方面，他们也被置于欧洲（特别是伊比利亚）语境。依欧式几何定律，这道习题会很无聊（两个平面的相交处只有一条直线！），但在历史学这门更灵活的学科中，却有希望获得更多可能：研究帝国主义的史学家们无疑会从中认出对19世纪欧洲帝国扩张的“欧洲中心论”和“偏离中心论”这两种著名解释的回音（Bayly 1989）。确实，作者对本书的构想是为关于早期近代欧洲帝国建构（empire-building）本质的更大争论有所贡献。因此，它不仅试着抓住上述议题，也抓住更棘手的问题，即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英国、荷兰在亚洲扩张的连续和断裂的程度。

然而这样的一部历史究竟该如何去写？何种材料是一个希望提供“公正解释”的历史学家所能凭借的？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得回到葡萄牙语文献本身，但这些当然不是我们仅有的史料。同时诸多葡萄牙文件的汇编也并不是众口一词。史料的性质（如信件、账本或编年史）、作者的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编年史家会带给我们极为不同的视野）、写作年代（对于1540年代的葡萄牙人而言，16世纪初从未如它在1620年代的作家笔下那样光荣）都会导致差异。对于修会的传教士写作者而言，差别则更多来自教派的性质：对于同一事件，耶稣会和奥古斯丁修会或方济各会的观点可能非常不同。

除了葡萄牙人写的史料，还有些其他形式多种多样的史料：其他欧洲人写的游记，例如16世纪晚期荷兰人扬·惠根·凡·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著名《游记》（*Itinerario*, Tiele & Burnell 1885），17世纪的公司（Company）交易文件，居住在葡属亚洲的意大利和德国商人的通信和回忆录。我们还有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史料，无论以书面形式（编年史、游记和书信）还是口头传统保存下来（Subrahmanyam 2005a: 17-44），其中最后一类史料长期被历史学家们忽视，出于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它们散落在广大的世界中，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太高，使得对它们的发掘不够充分。其次，更重要的是，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这些史料不可靠，因为它们把葡萄牙人笼罩在神话的云雾中，经不起基础的检验——在年代准确性上尤其如此。它们充其量最多能被用来证明葡萄牙人在亚洲无足轻重（因为许多亚洲史料基本上忽略了他们），或证明亚洲人过于关注自己，在文化上过于内卷，不需要在意这些新来者。

然而最后这种观点并不总是对的。让我们以这份成于17世纪晚期或18世纪早期的无标题马来语文本为例，它描述了葡萄牙人来到靠近马来半岛顶端的东南亚港口城市马六甲，如何夺取它、筑造城防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贸易中心，最终又如何被赶走。这样一段兴起、繁盛和衰落的轮回，自足完备且有其内在的逻辑。叙述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佛郎机人（Franks）来到马六甲。

熟知历史的人如是告诉我们，曾有十艘葡萄牙船自马尼拉来到马六甲做生意。当年在位的国王是艾哈迈德·赛亚苏丹，那